

沈从文的一张书单

■王道



沈从文(左二)、沈龙朱(左一)和家人在一起。

一直很好奇,沈从文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什么书?他有没有书单?一查,还真有。他在1935年6月的《青年界》上发表了一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那一年他33岁,在他的书单上列了三种书。

沈从文说他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并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成诵。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而之所以喜欢读医书,是因为好玩、实用。“从医书中我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小孩子既富于实验精神,家中恰好又正有一只花猫,因此凡家中人被鱼刺卡着时,我就把猫捉来,实验那丹方的效果。”在医书里,沈从文还学会了一些偏方,并试着做过实验,从而记住了不少药性和病名。

如果说第一种书是科学的兴趣引导,那么沈从文喜欢的第二种书却是实实在在的神话——《西游记》。“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这本书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当时觉得它是部好书,到如今尚以为比许多堂皇名著还好。”沈从文还以许多读者喜欢的《项羽本纪》为例,说西楚霸王只能活在书生脑子里,而《西游记》里的“猪八戒”虽是神话人物,却是很可爱的活人。

第三种书是一本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看来很有趣味”。但是因为看这本书,却看“掉”了沈从文的世袭将军梦。他在通读此书后发现自己体力不够统治人,行为不想受到拘束,且“孙子兵法”太过玄远,索性决定放弃将军梦,回到更喜欢的当前生活,做一个自由人。

由沈从文的“书单”继续寻迹

他的阅读兴趣,发现他在这次书单之后还做过一次文学书系点评(《读〈新文学大系〉》,署名为炯之,见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当时他提到了良友公司所编的几本文学选本颇为值得注意:《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

这套书的编选者可谓是名家云集,可见出版社对于编选质量是有所期望的。沈从文对这套选本总体觉得满意,只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个人意见,如:“茅盾选

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达夫)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花生不妨多选一点,叶绍钧可以不选)。”应该说,沈从文是看中这套选本的,因此给予真诚而客观的意见。

同时,他在此文中还提到了关于编书的一些注意事项也颇为有趣。一是编选者的个人趣味不

应该有损毁本的真正价值;二是编选者责任自觉,应该极客观严谨;三是“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四是“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实事”;五是版权问题,“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该给版税?”应该说沈从文所言编书五点,至今仍有价值。

从沈从文后来的文化研究可知,他的读书既广博也庞杂,后来把马、列、毛等大部头的文集都通读了至少一遍。早在1937年初,他的读书兴趣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如1937年1月1日的《字

宙风》“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专栏即刊登了沈从文的文章,他在文中列了两本书,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汪曾祺的回忆文章说,抗战时期,沈从文在云南时常借给朋友、学生们书,“联大很多学生手里都有一两本扉页上写着‘上官碧’的名字的书”,简直是在散书了,这显然与一些读书人的“书和夫人概不外借”的原则是相悖的。记得后来沈从文的学生诸有琼曾作《书兮归来》,呼吁曾借用沈从文的研究用书和史料书的人士尽快把书归还本人,此为后话了。

汪曾祺还记得老师沈从文读的书五花八门,“他的藏书也真是兼收并蓄。文学书、哲学书、道教史、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观赏植物……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一辈古人》汪曾祺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沈从文看书的习惯也很有趣,大量做批注并粘贴纸条,纸条上密密麻麻都是字。关键是有些题记和批注似乎与此书无关,“比如,有一本书后写着:‘雨季已过,无虹可看矣。’有一本后面题着:‘某月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一辈古人》汪曾祺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什么这个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难过呢?其实这样的疑问也好解释,作为一位敏感的作家,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浮想联翩,灵魂出窍,因此引发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感想也就不奇怪了。

沈从文对于借书很大方,似乎每借出去一次就是一份福分的积累。记得我到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先生的书房时,他也曾指着屋内堆积如山的书说,喜欢什么选一些,脸上满是微笑。

(上接第一版)一次,偶然在学校边的书店,看到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大众文艺丛刊》的刊物,赫然刊出一篇题名《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其中竟把沈从文冠以“粉红色作家”而横加鞭挞。当时,我仅认为这是个人之见,也没有过多关注。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从文先生命运转折的开始,行将从一名大学名教授、名作家,莫须有地改变身份,去做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说明员。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就十分清楚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一切的一切终于合乎规律地“偃旗息鼓”,趋向平寂。

我在1975年7月给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他寄赠的一页手书章草的五言诗条幅。看来是匆忙作覆。只在信封背面左下方,留下数行蝇头小楷。内容如下:

来信盛情厚意,极感谢。所寄习字、诗书多不足道,但供玩玩而已。

迟日当另作覆,奉告近况。总的说来,即日子过得很好,体力、情绪还如三十年前也。望释念。

时隔数十年之后,这是一封不得已用了掩饰之词,旨在释念的短笺。对照当时现实,沈从文人还在;比之他一些熟人的遭遇,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以后的往来,最难忘却的,当然是那一年为避唐山地震,沈从文从北京南下苏州,我与相聚晤的事了。

至今还记着的,是他脸上始终带着的笑,极令人难忘的笑。我们倾心而谈,谈得

那么欢畅,虽然也仍然会涉及他的不痛快的事——不公平的待遇。这对任何人都是无法避免的。临别时候,对他最为紧要的是,嘱托我常去看看巴金先生。还有,写信给上海博物馆的陶瓷研究工作者,他不能忘记他们去东北研究马蹄壶和辽三彩的进展情况。此外,就是托我去福州路上海旧书店淘几本当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人所著的《苏州织造局志》。他陪着我,从九如巷张家老屋,向大街的公交车站走去。当我上了车,车开始启动,只见从文先生还站在那里,在秋日的斜阳中,向我不停地挥手……

这以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封信。他为我们的见面而高兴,他说很难忘记,甚至列入避震苏居几个月的收获之一。他是一个十分珍重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人,他喜欢写信,感情的闸门,就在这里开放。他的书信,就是他情感的一部分,也是他长时期著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到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文物、考古、陶瓷、织造,以及保健、书法,形形色色的领域,无异于一座宝藏,为现代作家书信中所少见。

他是中国文化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沈从文艰苦生活,艰苦工作了几十年。在他小小的、窄而霉的居室内,祖孙三代合用一张写字桌。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

上,很长的时间里,冬天照例不许生火,晚上不允许用电灯;约有两个多月,都在零下十度。但这个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公学工作时,就被校长胡适称赞过的“难得的天才”,却照样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为这里的一件件陈列品分门别类,细致又耐心,写下了别人不屑一做却难以计数的说明。他的成绩看似平易,其实辉煌。沈从文年少时本就是军人,军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似乎就深烙在他的身上。他真正做到了为工作奋不顾身。就是这样,过去从没接触过的文物考古的课题,经过他的手,一个个完成了,并且是极富创造性地完成了。经由他,开启了一条注重实物、扬弃“以书注书”的新路。他的这一本由周恩来总理托付的、前无古人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终于完成了。

进入垂暮之年,阳光忽然照拂到了他的身上。海外研究沈从文第一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金介甫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找到我,一开口就称扬沈从文作为作家,是属于世界的。他认为沈次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乔伊斯,却高于都德和法朗士,以及纪德、莫泊桑。这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忽然想到。然后,金介甫又花了不少时间,埋首著述,连续写出了两本有创见的关于沈从文的专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沈从文传》。

是金子就无法掩盖它的光亮。有关沈从文的书,他的作品集,一本本出版了。他

的工作以及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但实在是在有点迟了,他来信,常常感叹体力不支。比如:

我的有限生命,很明显是为了责任,正如《庄子·大宗师》上提到过的“息我以死”名言,到死才算真正休息的……个人唯一可取处,只是十分认真、细心、耐烦,来用脑子而已。今年北京特别,气候寒冷,熟人中已陆续于一月中作古三五人,均不过一二月即故去,真所谓警钟频敲,不能不令人惊心动魄。弟今年已七十八岁,从表面上说来,还像比不少同年友好,经摔耐磨,用油省而能量大。事实上,一身零件,多日消耗到差不多程度,报废将亦只是迟早间事也。

沈从文叹息还有很多很多课题待他去完成,他不愿放下,也决不放下。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那么,他的后半生,被迫放下他作为作家的一支笔后,就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文化史的建设而奠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由此,那一年得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并不意外,也不突然。中国古人讲究“君子殉道”,他是为工作而献身的,工作就是他的“道”,为之而死,这自然是迟早的事。

我想起了“音容宛在”。这原是中国传统中悼念逝者常用的话。沈从文常常带着微微的笑容,和听来带有些艰涩的、轻轻的湖南话,似乎就在我眼前。但,逝者已矣。他,确实确实已辞世30周年了。